

《佛國記》西譯研究與傳播（八）

許尤娜

二、《佛國記》研究新方法：德籍華

裔胡海燕《東晉法顯《佛國記》

研究論文集·雙語版》（二〇

一七）

寧氏《高僧法顯傳研究》專書出版後，轉向玄奘《大唐西域記》研究。目前投身法顯研究最深的西方學者，應屬德籍華裔學者胡海燕博士。胡海燕博士於一九七八—一九八二年就讀北京大學暨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碩士學位，師從金克木與季羨林，主修梵文語言學及佛學。畢業後得季羨林薦往德國哥廷根大學攻讀印度學、藏學和漢學；一九八七年獲博士學位後，於德、奧、法、日等國從事佛學專題研究。¹二〇一〇年起以德、英語連續發表題目新穎的法顯研究，以跨學科的視閥，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以下略述五篇法顯研究要點。

第一篇德文論文〈跨越國界的西域求法高僧：試論法顯研究的新方法〉（"Chinesische buddhistische

Indienpilger als Grenzgänger. Ansätze zu einer neuen Deutung von Faxians Reisebericht Foguo Ji")，發表於《Dieter Schlingloff 八十華誕紀念集》（二〇一〇）。透過「相同性」與「相異性」，探究法顯的「邊界」觀念與「越界」敘述，提供「跨文化詮釋學」一種例示。以細緻筆觸、富啟發性的問題意識，探討《佛國記》四種「邊界」：人文邊界（敦煌土牆）、自然邊界（沙漠、高原、印度河、大海）、語言邊界（漢言、胡語、天竺語）、僧團邊界（部派、身分）；結論復強調「求法高僧」之人格特質的當代意義。讀者從中或能管窺德國佛學研究的跨領域特色；見識海外法顯研究的視閥水平。

第二篇英文論文〈法顯對天竺的認知：《佛國記》一些新詮釋〉（Faxian's Perception of India - Some New Interpretation of His Foguoji 佛國記），發表於日本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二〇一一）。交叉運用德國語言文獻學及佛教藝術史成果，重新詮釋《佛國記》

幾處隱晦的用語與段落。引用的材料包括下列數組：

其一、古印度文獻、地理學家考查、及巴爾胡特 (Bharhut) 浮雕圖像 (以論證法顯所述「傍梯」即梵文 *śaṅkupatha*) ；

其二、律藏、耆那 (Jaina) 文獻 (以探究中國邊地術語根源) ；

其三、二十世紀初吐魯番出土的梵文佛教劇殘卷 (以推測法顯在摩頭羅國所見伎樂，為一世紀馬鳴菩薩 (Aśvaghoṣa) 所撰《舍利子戲》) ；

其四、一九九八年巴基斯坦出土的三世紀末「鐵券」 (以證法顯在中天竺及錫蘭見聞) ；其五、律藏經文 (佐證法顯親身經歷的客僧接待戒律) 。

豐厚的文獻及流暢的論述，可代表性看出作者如何從《佛國記》文本發展其敏銳的問題意識；如何在歐洲佛學研究成果上，嫻熟駕馭語言文獻學、藝術史方法學。論文第五小節立「近三十年法顯研究概況」，依觀點方法分成七類：文末附錄「一九八一—二〇一〇法顯研究」共二十七筆書目，含四筆中文研究、九篇日文研究、十四筆德英文研究 (俱詳本論文〈緒論〉)。對於法顯及《佛國記》中西文研究，作了精要整理回顧。

第三篇英文論文〈消失的作者：誰寫了法顯《佛國

記》的跋文？〉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Author - Who wrote the anonymous epilogue to Faxian's Foguoji) ，發表於日本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 (二〇一三)。問題意識明晰，篇幅短小精美，作者聚焦探討《佛國記》文末〈跋文〉作者問題。依文本所附年代，推論《佛國記》經歷略詳二種版本；考量《佛國記》文本結構與敘述風格，判斷最後成書建康道場寺；並依史料探討其時道場寺檀越、推測《佛國記》跋文作者可能為當時道場寺檀越——孟顗。此結論有待商榷，本論文第二章已作辨析。

第四篇〈法顯的觀音崇拜與二八六年竺法護所譯《正法華經》 (Faxian's Worship of Guanshiyin and the Lotus Sūtra of 286) ，發表於日本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年報第十八期 (二〇一五)。其問題意識為：法顯求法歸程遭逢兩次九死一生的海難，皆祈求觀世音護祐，其依據的佛教經典為何？結論是竺法護三世末《正法華經》譯本。並指出《佛國記》所記乃最早的海難祈求觀世音文獻。

第五篇〈五世紀中國西域求法高僧的心理極限挑戰〉 (Grenzerfahrungen der chinesischen Indienpilger im fünften Jahrhundert) ，收錄於德國出版的《智者悄悄離

去：Peter Greiner教授（一九四〇—二〇一〇）紀念論文集》（二〇一六）。² 依作者自敘，此文據二〇〇九年弗萊堡大學「聖跡之地，神聖之城：亞洲文化中的朝聖物及朝聖地」會議論文修訂而成。作者企圖採取歐洲法顯研究的新方法——「心理學」觀點，針對《佛國記》表述「內在情感」段落，逐一分析討論。其著重《佛國記》文本的敘述風格，並側重敘述者的「心理」觀察，對作品的文學性有啓發之功。

胡海燕上述五篇研究於二〇一七年十月由台灣圓光佛學研究所集結出版，題為《東晉法顯《佛國記》研究論文集》（雙語版）。胡氏跨越德、英、日、中四地的移地研究，最終於台灣佛學研究所付梓，代表法顯研究已超越一般性的學術研究，得僧伽教育認可、裨益於「促進高僧文化的深入研究」。³ 值得讀者再注意者，是圓光編輯室為封面封底版面所貫注的美學品味：封面以天空藍為底色，中置莊嚴法輪一座；昇浮於寫意潑墨峰巒。中英書題之上，輕巧鑲飾所徽紅蓮一小枚。封底簡介文字之上，安安靜靜浮印一個飽滿靈動感的「佛」字墨跡（詳下書影）。整個版面呈現一種空靈幽遠玄境，頗引人遐想慧遠佛影臺「淡彩圖寫，色疑積空」、謝靈運《佛影銘》「借空傳翠」之美感效果。⁴

三、新版法文譯注：戴仁《法顯佛國記》（二〇一三）

二〇一三年，距離一八一四年雷慕沙初任世界首



書影1：胡海燕《東晉法顯《佛國記》研究論文集·雙語版》（二〇一七）封面、封底簡介

位漢學教授二〇〇年，巴黎法蘭西學院推出新版本《佛國記》法文譯注。研究絲路文化、敦煌圖像學、中國寫本的法國漢學家戴仁（Jean-Pierre Drège, 1946-），在六十七歲推出他親自校注、法譯的《法顯 佛國記》（Faxian, Mémoire Sur Les Pays Bouddhique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就書籍外觀言之，水藍色封面（見本論文〈緒論〉）、約三十二開規格（12.5 x 1.9 x 19.2 cm），使這本實體書具有空靈悅目且輕便易攜的印象。

在形制上，全書三九八頁，不論相對於雷慕沙法文舊譯五四〇頁、或寧梵夫德文研究七四〇頁，其輕靈巧體態已擺脫學術專書之冗重形象。書內編排分三個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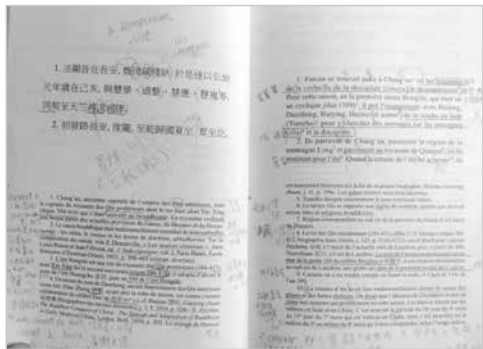
- 一、導言（頁IX-XXX）、參考書目（頁XXXI-XLIX）、重要年代（頁LI-LII，含十種書題及十六種版本）、地圖（頁LIV-LVI）；
- 二、《佛國記》文本：中文、法譯分列左、右兩面（頁一八十一）；

三、附加注解（頁八十三—一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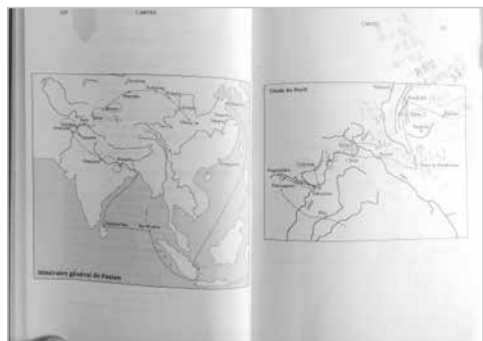
《佛國記》譯文方面，不再將文本分大章節、而是將全文切分為一百三十七個小段落。版面上有二個技

術性處理：其一，中文原文與法文譯文呈左右頁對照，當頁附簡短的注釋；其二，較長的注釋全挪至譯文之後「補充注解」。例如頁十七「迦膩色迦王大塔」段落結束處標示注解一〇七，當頁注云「見附加注解」（Voir notes complémentaires p.87），此一注解占有五頁半篇幅（頁八十七—九十二）（書影詳下）。

短注、長注分開而列的方式，透露了「文本為本、注解為末」的翻譯理念；更重要的是，這種短注、長注分開別置方式，某程度言之，似乎有效地解決翟理斯重譯本的顧慮（旅行冒險的閱讀樂趣被冗長注釋干擾）。可以說，上述編排上的巧思，使戴仁這個法文新譯本，更貼合法顯《佛國記》固有的典雅與簡約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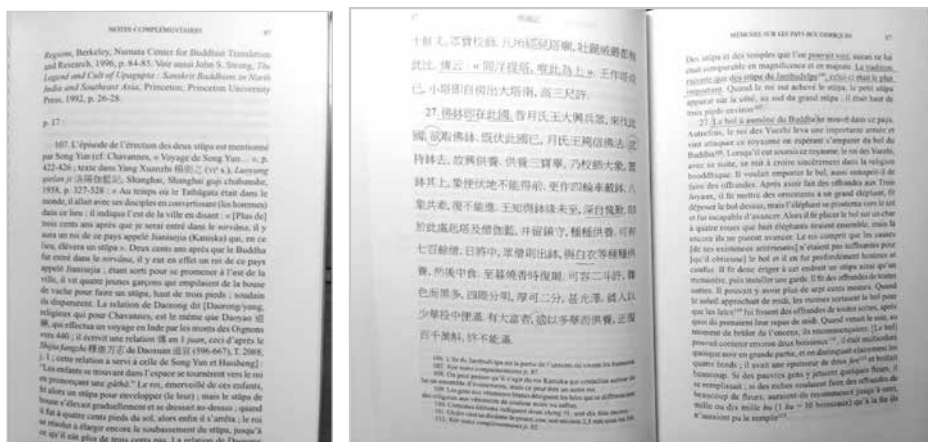


戴仁《法顯 佛國記》（二〇一三）書影之一：切分為一三七小段。左頁中文、右頁法譯、當頁短注（長注置後）。



戴仁《法顯 佛國記》（二〇一三）書影之二：法顯遊履陸海路線地圖、北天竺地圖

在譯文之前，有二十二頁〈導言〉，戴仁在其中扼要敘述二百年來東西方的法顯研究成果，並略述他出版「新譯」動機。細部要點如下。



戴仁《法顯 佛國記》
(二〇一三) 書影之四：
頁八十七「附加注釋」
P. 十七第一〇七 (篇幅
涵蓋頁八十七-九十二)

戴仁《法顯 佛國記》(二〇一三) 書影之三：
中文頁十七當頁注第一〇七：「見頁八十七附加
注釋」→

(書影二：戴仁《法顯 佛國記》(二〇一三) 左中文、右法譯排版、當頁短注、法顯陸去海還路線圖)

頁XXII(九一十一) 列述中國的求法行記作品，揭示法顯行傳的創新地位；頁XIII-XVII(十三-十七) 述法顯生平及求法行程；頁XVIII-XX(十七-二十) 述法顯行記在漢文史籍中的異名與著錄；頁XX-XIII(二十一-二十二) 述雷慕沙《佛國記譯注》出版之後，日本、中國學者(足立喜六、章巽)的校注新本、追溯文本從宋代以降在《大藏經》源流(stemma des diverse éditions)；頁XXII-XXV(二十一-二十五) 引蘭德思(導言)述雷慕沙法譯《佛國記》如何披荆斬棘作開創之功，Eugène Jacquet、Horace Hayman Wilson(一七八五-一八六〇)二人對雷氏譯注的考證評論、布努夫《印度佛教史概論》(一八四四)引用此書、萊德利據之英譯、古寧漢(Alexander Cunningham，一八一四-一八九三)據以考古、哈弟(Spence Hardy，一八〇三-一八六八)與拉森(Christian Lassen，一八〇〇-一八七六)及柯潘(Karl Friedrich Koepfen，一八〇八-一八六三)據以進行佛教研究；啓發海軍牧師畢爾一八六九年的英譯；引述儒蓮對其師雷氏遺著「有錯誤之虞」的評論(見本章第二節)。

頁XXV-XXVIII(二十五-二十八) 簡要述評畢爾、翟理斯及理雅各三個英文譯注的優劣，亦引翟理斯對畢

爾英譯錯誤處之評(頁二十五)，及瓦特斯「畢爾中文欠佳，翟理斯佛教素養不足」之論(頁二十七)；翟理斯一九二三年重譯本；李榮熙一九五七年英譯本；以及寧梵夫引考古成果而詳宗教史地考據、復融合日文研究的德文譯注。

頁XXXI-XXX(二十九-三十)最後一段盛譽寧梵夫詳瞻的佛教學養，同於章異校注本；但話鋒卻轉：法顯行記不像玄奘《西域記》那樣濃稠和華麗(*la constance et la richesse*)、那麼馳名而值得重譯，然而譯者爲了重振戴密爾(*Paul Demiéville*)之見「她依然是個珍貴作品，不論從時代還是豐美的旅程來看」(頁XXX)，決定重譯。在技術上爲補救法顯未解釋或極簡的留白處(*silences de Faxian*)，會依玄奘《西域記》闡明相關事件或段落，特別是佛陀生平細節；佛教術語則挑選必要處予以說明。最後，譯者強調他對作品標題寧可選擇在中國少用的《佛國記》，因爲與作品內容更爲相稱。

戴仁這篇〈導言〉將《佛國記》在西方的翻譯與流傳，作了極爲精要的勾勒；對在中國宋、明二代《大藏經》與私人刊刻情形，亦不含糊。對於文本的簡約風格帶有欣賞；對作品的標題亦有獨特見解——與雷慕沙使

用《佛國記》的看法是一致的，而與田曉菲的《法顯傳》看法不同。

另外，頁XXXI-XXX(三十一-四十九)有極詳瞻的法顯研究書目；頁II(五十一)是南北朝胡漢政權、隋、唐年代，及法顯西行年表及法顯同行相關人物年表。頁II(五十二)依年代列法顯行記的異名、中日《大藏經》法顯傳刊刻年代，及一四九六-一八〇四年六種叢書刊刻；⁵頁LV-LVI(五十四-五十六)有三張清晰的法顯行旅路線地圖，一張全圖，一張北印，一張中印度。

注解方面，戴仁譯本頗見新材料與新觀點。例如，在譯文初始，注腳第八「乾歸國」，先略述乞伏乾歸(公元三八八-四一二在位)統治金城、苑川事，後即著重蘭州「炳靈寺」——建於五世紀初——第一六九窟出現「法顯」(供養人)之名。⁶又如，注解第四(「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寗等」條)，戴仁似乎認定：法顯長安同契「道整」，即是前秦苻堅朝臣趙整(政/正)，頗費篇幅說明趙整與苻堅、道安之密切關係(與道安共同主持長安譯場；苻堅亡後出家爲僧)。其觀點可與寧梵夫及王亞榮⁷觀察參看。

除了上述法、英、德文三種西譯，二〇一四年義大

利亦推出法顯《佛國記》義文譯注。⁸又，根據薛克翹研究，佛教發源地印度於一九一八年即出版法顯《佛國記》印地文譯本，二〇〇一年重印之；二〇〇〇年尼泊爾亦有譯本；此外尚有孟加拉文譯本。⁹這些西、東方的翻譯研究，具體說明一六〇〇年前法顯的佛國朝聖遊記，確乎堪稱「亞洲佛教的瑰寶、世界文明的珍奇遺產」。¹⁰

伍、結語

《佛國記》在西方傳譯已歷二百年。一八一四年二十六歲的雷慕沙接任法蘭西學院首位漢語教授，「漢學」正式成爲一門學術專業。一八一六年雷氏獲《佛國記》中文，旋即展開研究，揭開歐洲「漢傳佛教」研究序幕。一八三六年雷氏遺著《佛國記譯注》被譽爲「歐洲佛教研究史上的大事」。一八四八、一八六九、一八七七及一八八六，在印度、英國及上海，陸續出版萊德利、畢爾、翟理斯及理雅各四種英文譯注本。其中，在華傳教三十年、譯有儒典九經的理雅各，以七十一歲出版《佛國記：漢僧法顯天竺錫蘭求法行記》，可謂《佛國記》西譯研究第二次高峰。二十世紀有兩種不帶注解的清新英譯本：翟理斯

七十八歲重譯本（一九二三），及華人李榮熙英譯本（一九五七）。沈寂百年後，德籍學者後來居上：寧梵夫出版《作爲宗教史料的高僧法顯傳》（二〇〇五）；胡海燕《東晉法顯《佛國記》研究論文集·雙語版》（二〇一七）在台灣出版。二〇一三年法國推出戴仁新譯《法顯 佛國記》。相承不絕的西譯與研究，見證五世紀初漢僧法顯無私求法的宗教虔誠與遊觀書寫之價值。

當然，最後還是必須強調，本文純是拋磚引玉，而摘述未臻完備，評論亦不夠深刻，且容後待學力增上，時間充裕些時，將再增補加強。（全文完）

註釋：

1. 關於胡海燕博士投身法顯研究歷程，參見〈胡海燕博士致《圓光佛學學報》第二十三期讀者〉。
2. 書名及出版資料為Der Weise geht leise. Gedenkschrift für Prof. Dr. Peter Greiner (1940-2010), hrsg. von Harro von Senger und Haiyan Hu-von Hinüber, Harrassowitz 2016, pp. 15-32.
3. 見《東晉法顯《佛國記》研究論文集·雙語版》（桃園市：圓光佛學研究所，二〇一七）封底編輯室簡介文字。

4. 見本論文第四章〈前言〉引述蕭馳對晉宋山水詩學之觀察。
5. 這六筆分別是(編者姓名及生卒年為筆者依頁二十所補): 一四九六之前 陶宗儀(一三一六前—一四〇二前)《說郛》; 一六〇三胡震亨(一五六九—一六四五)《祕冊彙函》; 一六三〇之前 毛晉(一六九九—一六五九)《津逮祕書》; 明代 鍾人傑《唐宋叢書》; 一七八二《四庫全書》; 一八〇二—一八〇四張海鵬(一七五五—一八一六)《學津討源》。在頁二十還提到明代《五朝小說》及清代《稗乘》。
6. 關於法顯之名出現於炳靈寺, 可參見張南南, 〈甘肅炳靈寺第一六九窟法顯供養人像及其意義〉, 《四川文物》, 二〇〇二(二), 頁五十六—六十一。
7. 參見王亞榮, 〈論法顯與秦地佛教之關係〉, 《戒幢佛學》第三期, 頁一〇—一一。
8. 筆者未購得此書, 僅從網路得其出版資料: Ester Bianchi, Faxian: un pellegrino cinese nell' India del V secolo—Con traduzione del diario di viaggio Gaoseng Faxian zhuan (Nuova edizione), Italy: Morlacchi University Press, 二〇一四。(《法顯: 五世紀中國僧侶的印度朝聖行旅——高僧法顯傳》)
9. 尼泊爾文譯本計七十一頁, 譯者為巴德利·納拉揚·普拉丹 (Badri Narayan Pradha) (錫金建設出版社, 二〇〇〇), 是依據李榮熙 (Lee Long-hsie) 英譯本 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Countries (中國佛教協會, 一九五七) 轉譯。印地文譯者賈甘莫漢·瓦爾馬 (Jaganmohan Warma), 書題為《中國旅行家法顯的遊記》(Chinies Monk Faxian's Record of Traveling), 三十二開本, 一一一頁: Carsi Civil Union (凱西公民宣傳聯合會) 一九一八年刊印第一版; 二〇〇一年 Indian National Library Traus. 第二版。孟加拉譯本譯者為 Prof. Samaddar。以上資料參考自薛克翹〈關於《法顯傳》的印地文和尼泊爾文譯本〉(2003-3-7, <http://www.sasnet.cn/zuixingc/showcontent.asp?id=19>, 搜尋日期: 2013/10/12)
10. 胡海燕《東晉法顯〈佛國記〉研究論文集》封底簡介文字。